



市场经济下的“道德诚信”与“法律诚信”

万 敏

(长江大学 政法学院, 湖北 荆州 434103)

摘要:道德与诚信是一个被社会广泛关注,却又在人们的行动中常被忽略的问题。针对诚信在社会生活中严重缺失,明确区分道德上的诚信与法律上的诚信,建立现代公正意义上的诚信美德,加强对诚信和公正的法制保障,是道德建设和信用制度建设需要共同关注的课题。

关键词:道德诚信;法律诚信;公正

中图分类号:D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04)06-0111-03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诚信之邦”的美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人无信不立”的古训也世代传承,然而,当今社会人们却越来越频繁地遭遇诚信缺失的无奈:假酒、毒米、陈馅月饼、虚开增值税发票案、基金黑幕、足球黑哨、高考作弊……面对商界、政界乃至学术界愈刮愈烈的坑蒙诈骗、假冒伪劣、浮夸造假之风,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们在痛心疾首之余,不禁从内心深处发出了对“诚信”这一传统美德的阵阵呼唤,与此相呼应,社会各界对诚信问题的研讨也格外热闹,以致类似“诚信”之类字眼一时间在各类媒体上煞是流行。因此,明确区分道德上的诚信与法律上的诚信,建立现代公正意义上的诚信美德,加强对诚信和公正的法制保障,对维护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

在力图解决当前社会生活中不同程度的信任危机时,人们总会想要借助“诚信”这一传统道德规范的力量。在我国,“诚”与“信”是基本精神相通的两个概念,《说文解字》中对二者的解释是:“诚,信也”,“信,诚也”。“诚”与“信”的结合,就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文理想与伦理规范。从道德范畴来讲,诚实即待人要真诚老实,不欺人、不骗人,“开心见诚,无所隐伏”。信用是指社会对一个人信誉操守的评价程度,讲信用者言必行、行必果。“诚信”范畴流传至今,它的含义虽然没有太大的变化,主要指个人所具有的真实实意、诚实守信的品质、行为准则与价值取向,也指社会整体在制度与文化等方面所具有的一种真实无伪、诚信无欺的环境状态、行为规范与价值定位,但实际上,我们一直引以为骄傲的传统诚信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信并不是一回事。中国传统的诚信只是对个人修养的倡导而不是对社会所有成员的诚信要求,它仅限于自然经济下封闭的亲人熟人小圈子的关系,是传统诚信观的一种形象化表述;而现代道德所讲的“诚信”,是在社会公正原则指导下的“诚信”,是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诚信”,它特别看重行为主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公共生活领域履行义务的社会信用。

所以,诚实守信作为基本的为人之道和重要的行为规范,所反对的是欺诈、虚伪、反复无常,它是个人立身处世所应具备的美德与价值追求,也是社会合作所应具备的道德基础。从规范的角度来看,它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它通过“应当真诚、遵守诺言”等一系列道德性行为戒律来指引、评价、纠正、教化人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具体行为;从价值的角度看,作为社会制度之一的法律,应以实现社会的普遍诚信为其目的之一,并以诚信作为其内在的道德基础。在当代我国的公正原则就是主张权利和义务的统一,确保公平和效率的最佳结合,而当今社会信用危机的要害,就在于逃避履约义务,破坏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既损害了效率,又践踏了公平,从而背离了现代道德的目标——社会公正,所以,人们对信用危机的鞭挞,对诚信的呼唤,说到底,就是对社会公正的追求,就是要建立以资产信用和道德信用为基础的信用法律制度。应当说,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体系,这为规范市场行为,激励守信,惩治失信提供了基本的法律规范。然而,为什么会出现“诚信危机”?究其本源,在于每个世俗的人都有一种最大限度寻利的自然冲动,这种冲动被两种基本的社会要素所规制,那就是道德理性和法律强制。人是精明的动物,他在决定实施行为前,往往需要把成本和收益进行理性计算。在道德、法律、利益上的徘徊,为的是寻找一个可以使自己付出的成本与收益差最大的方法,只要利益的诱惑大于可能受到的惩处,就总有那些以身试法者“前仆后继”,他们并不想以等价交换来获取利益,而是以欺诈等低于等价的成本来获取利益。一旦这些行为没有得到及时遏制而习以为常时,诚信就开始失去存在的土壤,结果将是市场秩序的崩溃,人民生活的混乱。立法者们试图通过一次次的修正法律来改变这种现象,但却发现无论如何努力,只要人们心存恶意,总能找到规避的方法,于是人们将市场中的道德规范法律化,使之成为一条强制性条款,这就是民法中奉为“帝王条款”的诚信原则。从某种角度上讲,诚信作为法律原则出现是人类的不幸,因为这意味着人们已不能完全依靠彼此的道德情感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二

我们还应看到,法律规范与伦理道德上的诚信规范毕竟属于性质不同的事物,它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调整手段。如果我们把道德上的诚信,简称为“道德诚信”,那么法律上的诚信,可简称为“法律诚信”。诚实信用作为法律原则始自罗马法,后来被法制史中重要的民法所继承和发展,比如法国民法、德国民法、瑞士民法等;它也是我国现行法律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原则,在《民法通则》、《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由于其适用范围广,对其他法律原则具有指导和统领的作用,因此又被称为“帝王规则”,可见其并非一般的、普通的原则。作为一项法律原则,它是以国家强制力量保证各法律主体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在民商事活动中必须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忠实于事实的真相,善意地行使权利和履行契约义务;同时,诚实信用原则在法律事务上还具有判断、解释、评价之功能,法官处理民商事纠纷,在法律规定不够细致或者当事人约定不明、客观条件变化的情况下,可以据此裁判。在诚实信用成为法律规范的时候,违反它所承受的将是一种法律上的责任,或者不利于自己的法律后果,这种法律后果可以是财产性的,也可以是人身性的;可以是民事的、行政的,甚至可以是刑罚。因此,诚实信用又是支撑社会的法律的支点。

从渊源上看,法律诚信源于道德诚信,是道德诚信的法律化,二者具有相辅相成、相互维系的关系,法律诚信必须有相应的道德诚信作为基础和依托,否则就会成为无根之木;而道德诚信也必须有相应的法律诚信作为保障,否则就会柔弱无力。还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的法律诚信还源于西方文化中的道德诚信,因而在对其进行解释和适用时,就必须考虑其在西方法律体系中的本来含义,而不能仅从中国传统的道德诚信出发而对其进行望文生义式的理解。中国传统的道德诚信与西方文化中的道德诚信虽然具有基本相同的内涵和要求,但也有实质性的区别,西方文化中的道德诚信具有普适性,它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全面展开的道德基础;而中国传统的道德诚信是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的产物,主要适用于封闭的、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朋友和熟人之间的伦理准则,因此,中国传统上缺乏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能够支撑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化的道德诚信,这也是中国在由传统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一些诚信缺失问题的重要文化原因。所以,中国传统的道德诚信只是为引入西方的法律诚信奠定了一定的伦理基础,但要想使之成为法律诚信所依托的道德准则,则决不可忽视改造其不适应的一面。

法律诚信脱胎于道德诚信,但是法律诚信在继承道德诚信的遗传基因的同时,也发生了一些变异,具有了法律上的特殊的宗旨和功能。事实上,准确界定法律诚信的含义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该原则除了具有“诚实守信”的字面含义外,还含有附加的、引申的其他含义。汉语中的“诚信”一词与西方相应术语的字面意思相近,但不具备其特定的法律含义,按照我国学者的一般理解,法律诚信体现的是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维持双方的利益平衡以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平衡的立法者意志,其目标在于实现三方的利益平衡,保持

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有两个:一是要求当事人以善意、诚实、守信的态度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善意”要求人们在进行有关民事活动时尊重他人的利益,主观上不能有损人利己的心理,并且要以应有的注意程度防止损害他人利益;“诚实”要求人们在进行民事活动时实事求是,对他人以诚相待,不得有欺诈行为。二是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使法官可以根据公平正义的要求进行创造性的司法活动,以弥补立法的缺陷与不足,努力实现个案处理中的具体公正。法律诚信没有清晰的内涵和确定的外延,其适用范围极为广泛,当立法者在具体立法中未能穷尽难以预料的情形或设定出恶法条款时,法官可本着公平正义及良知行使自由裁量权,能动地裁判案件。因此,它能够协调法律规定的有限性与社会关系的无限性的矛盾、法律的相对稳定性与社会生活的变动性的矛盾、法律的正义性与具体规定在某些情况下适用的非正义性的矛盾。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法律诚信所具有的独特宗旨和强大功能——保持各方利益平衡。

这样,法律诚信的这一独特宗旨和强大功能使它呈现出与道德诚信几乎完全不同的“相貌”,以至于我们可能会怀疑它和道德诚信究竟有没有关系,实际上,道德诚信就躲在法律诚信的背后,它无时无刻不在通过法律诚信发挥着作用,而法律诚信在骨子里也恰恰体现着道德诚信的要求,它也无时无刻不在实现着道德诚信的使命。这是因为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们需要互相合作以增进彼此的福利,人们合作的基础是道德诚信,道德诚信是当事人从合作中公平地获利的保证,如果没有道德诚信,当事人在合作中的利益关系就会失去平衡,从而影响、危及到一方当事人的生存或其生存的物质基础,所以,道德诚信并不是人们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它只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的准则,它要求人们做到两点:一是言语要真实,即向他人发出的信息要真实,以保证相对人能够根据真实的信息做出正确的、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二是要恪守诺言、履行义务,以实现相对人的利益。一般来说,在当事人都能做到这两点的情况下,双方的合作(包括交易)就是公平的,双方的利益关系就是平衡的。可见,道德诚信的基本作用就在于要求当事人尊重相对人的利益,维护相对人的利益,保证当事人都能够通过合作实现自己应得的利益。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当事人都做到了道德诚信,却并不能实现双方的利益平衡,比如出现了情势变更,这时候就需要重新调整双方之间的利益关系,而不能机械地强调恪守诺言。因此,只强调道德诚信是不够的,道德诚信并不能必然地实现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道德诚信只是手段,实现利益平衡才是目的,真正应该强调的是“保持各方利益平衡”。这正是法律诚信比道德诚信“高明”的地方,它抓住了更根本、更关键的东西,因此它已经超越了道德诚信,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如果道德诚信仅仅停留在“诚实守信”而没有上升到“保持各方利益平衡”,那么它仍然属于道德范畴内的自我升华而没有上升为法律诚信,道德诚信上升为法律诚信这一事实本身已经说明道德的力量不足以维护诚信,它需要借助法律的力量。然而,法律诚信的目标已经定位于“保持各方利益平衡”而不再是“诚实守信”。立法者规定什么是诚实守信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事情,而要确定当事人之间的利益怎样才是平衡的就很不容



易了,因为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千差万别的,立法者根本不可能把各种社会关系的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都无一遗漏、明明白白地规定清楚。因此,立法者只有一条路可走,即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这样,法律诚信就诞生了。

三

建立社会诚信要求完善机制,依法治理。信用表面上是一个道德问题,但其本质是一个法治问题。诚信道德规范有赖于公平与正义的社会秩序的支撑。在公平与正义能够得到基本维护的时候,诚信的力量、道德的力量就会强大起来。要建立规范的社会诚信体系和失信约束惩罚机制,从制度和法律上约束失信行为,为社会诚信建设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根据世界各国诚信建设的经验,社会诚信体系中的失信惩罚机制能够有效地消除绝大部分失信现象的出现,改善市场秩序,最终重建社会信任。制度建设首先是减少遵从诚信道德行为的代价和成本,不能使诚信者总是成为事实上的吃亏者,不能使违反诚信道德者有利可图,这就需要社会制度安排能够保障最起码的公平与正义。要有严格的惩罚和激励机制,要在制度和法规上保证诚信者能够得到应有的回报,失信者必须承担其相应的责任,社会不仅要对其予以舆论谴责,更要使其付出经济上的代价,甚至刑事上的惩罚。完善的机制与严格科学的管理相辅相成。近期国内外一些大公司失信的实践证明,若企业内部管理没有建立良好的“防火墙”机制,没有严格科学的管理制度,对经营权力没有严格的约束机制,在问题发生时不能及时纠错,再大的企业也很难在利益面前始终保持清醒。所以,提高社会的整体信用程度,就要认清诚实信用原则的双重属性,既要道德教育方面入手,又要从法律制度建设上下功夫。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指出: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本身并不能保证效率,一个有效率的自由市场制度,除了需要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相配合之外,还需要在诚实、正直、公正、正义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

道德的感化作用建立在行为人的自省和自控基础之上,如果行为人的道德堤坝没有在内心里筑起,则“道德经济”就难以实现。事实是,一些人为了获取利润常常不顾社会利益,“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家就敢冒杀头的风险”。这些都说明一个问题,即道德的约束不是万能的,尤其在一个没有市场经济积淀的国家更是如此。既然逐利是人的本性使然,那么如果放任商人的本性行为又会怎么样呢?社会上千千万万个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追求,如果听任他们本体意志的自由发挥,则社会就可能丧失基本的道德规则。可见,夸大道德的内在约束力,单靠道德的归化作用,以期建立一个既符合传统文化的特质又能充分发挥市场功效的诚信社会是不现实的。

通过法律的强制力打造诚信社会有着法理和现实的基础。一来它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应有之义;二来用法律来评判商家行为具有现实可能性;三来法律的强制力能够通过惩治不法奸商来纠正失衡和不道德的社会行为。

缺乏道德内涵的法律,即使得到全面实施也很难成为打造诚信社会的基石。同样,执法者任意曲解法律,将执法作为

谋取个人或部门利益的手段更是违背法律正义的行为。因此,打造诚信社会离不开法律的调控,它有赖于立法者制定出充分反映道德需求的法律规范,有赖于执法者严格依法办事。只有两者结合起来,才是建设诚信社会的正途。

区分法律诚信与道德诚信的主要意义在于:法律诚信和道德诚信并非同一范畴,研究分析诚信问题的时候不可简单地将二者混为一谈,它们具有不同的功能,不能互相替代,但是可以互补;诚信缺失问题的解决,既要依靠法律诚信,也要依靠道德诚信;既要依靠法治,也要依靠德治;法律对于道德诚信的维护,也并非仅仅依靠诚实信用原则,事实上民法上的许多制度以及经济法、行政法、刑法等许多法律的相关规定都在维护着道德诚信。譬如,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再比如,我国《刑法》对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以及金融诈骗罪、扰乱市场秩序罪做出了详尽的规定。其实,我国《宪法》的一些规定也直接体现了道德诚信的精神,例如第五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可见,从法治的角度看,维护道德诚信是宪法和各部门法的共同任务,而不仅仅是民法的任务,更不仅仅是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的任务,明确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就可以从法律体系的整体上来分析研究怎样构建一套系统的、完善的维护道德诚信的法律机制。例如,我们可以深入分析民法、经济法、行政法、刑法在维护诚信的法律机制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契约经济,也是法制经济,健全的法律体系是正常的信用关系和信用制度得以维系的保障。借鉴国外信用制度的成熟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建立包括个人信用制度和企业信用管理制度在内的社会信用体系,进一步加大对失信行为的处罚力度,是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建立良好的市场和社会运行秩序的重要保证。建立信用制度的关键是建立企业、中介机构和个人的信用档案,根据成本——收益原则,不仅要使信用违约成本大大高于违约收益,而且要使有不良行为记录者名誉扫地,或被绳之以法;要通过具有法律强制性的外部约束力量——制度来规范信用活动当事人的信用行为,引导人们内在心态变革和守约意识的提高,使其在短期的违约收益和长期的信用损失之间做出明智选择,规范其行为向长期守约的方向发展,形成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环境,确保立法公正、司法公正。总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和公正要有法制保障,要通过法制使人们在合法的渠道里实现个人收益的最大化,增大失信者行为的成本,杜绝失信者的任何侥幸投机心理,使诚信与公正美德“藏于官则为法,施于国则成俗”,形成扶正祛邪、扬善抑恶的社会环境,真正实现道德诚信的美德。

责任编辑 尚利